

# 近代泰国的平衡外交与日泰合作历程考

王鹏飞

**提 要：**自1887年日泰两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以来，泰国视日本为近代化改革典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加深对日交流。1932年泰国立宪革命后，銮披汶·颂堪军人政权为确保政权合法性与民族资本扩张需要，刻意鼓吹“泛泰主义”，采取亲日反英法的外交政策。泰国利用地缘政治优势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国缔结《日泰攻守同盟》。日本借助泰国支援迅速席卷东南亚，泰国也凭恃日本支持向“泛泰民族”所在地区扩张，但最终因日本的溃败，“泛泰主义”走向破产。

**关键词：**平衡外交；泛泰主义；日泰攻守同盟

## A Study of Balanced Diplomacy and the History of Japan-Thailand Cooperation in Modern Thailand

Wang Pengfei

**Abstract:** Since 1887, when Japan and Thailand concluded 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Thailand has regarded Japan as a model of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and deepened exchanges with Japa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and the need for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capital, the military regime of Luang Pheon Sonkham deliberately advocated "Pan-Thaiism" and adopted a pro-Japanese and anti-British-French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1941, the two countries concluded the "Japan-Thailand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lliance". Japan quickly swept through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support of Thailand, and Thailand also expanded to the area where the "Pan-Thai nation" was loc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Japan, but eventually the "Pan-Thaiism" went bankrupt due to the defeat of Japan.

**Keyword:** Key words: Balanced Diplomacy; Thaiism; Japan-Thailand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lliance

近代以降，亚洲各国普遍受到“西力东渐”冲击，东亚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推翻旧制，打破封建幕藩体制与身份制，在绝对主义天皇制下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具有共同归属意识的民族国家，以举国之力迅速西化开启近代转型。东南亚的泰国（故名暹罗）面对英法殖民者的夹击，也唯有励精图治迅速实现自国的近代化改革，同时在外交上斡旋于世界列强之间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自泰国拉玛五世起励精图治实行近代化改革，将赢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获得与西方列强平等权利的日本视为亚洲近代化的典范。

1887年日泰两国建交后基于“亚洲主义”迅速接近，日本和泰国作为亚洲唯一的独立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许多领域加深了相互交流。1932年泰国立宪革命后，军官集团借推翻复辟保护宪政之功绩上台。銮披汶·颂堪军人政权受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层支持，为确保政权合法性与民族资本的扩张需要，刻意鼓吹“泛泰主义”。但是，因自身实力欠缺，泰国利用其地缘政治筹码与轴心国集团接近，采取亲日政策，加深了与日本的军事相互依存关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泰两国缔结《日泰攻守同盟》。关于近代日泰外交合作问题，既往研究侧重于阐述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泰关系的演变，认为泰国与日本缔结攻守同盟结盟是泰国民族主义兴起与日本南进计划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战后泰国凭借平衡外交政策得以避免作为战败国遭受惩罚。但是对近代日泰外交的历史背景、现实动因、合作历程缺乏系统性梳理，对于泰国长期奉行的平衡外交政策亦缺乏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的细致分析，尚有拓进空间。本文旨在

利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档案，公文及报纸期刊作为原始资料，综合泰国、前苏联、澳大利亚的学术著作，厘清自1887年以来近代日泰两国外交合作的轨迹以求教于方家。

## 一、近代泰国的殖民地化危机与平衡外交的缘起

泰国，古称暹罗。其国境“东部毗连柬埔寨，东北部与老挝交界，西部和西北部与缅甸为邻，南部与马来西亚接壤，东南部邻泰国湾，西南部濒安达曼海”。<sup>[1]</sup>地处东南亚之心脏地带，既是通往中南半岛的门户，又是东西方之间文化的交互地，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近代以降，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船坚炮利相继染指东南亚，从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紧随其后是英国、荷兰、法国，西方各国为保持和巩固资本在东方的利益凭借其跨时代的军事代差对东南亚各地进行武装占领。

19世纪西方列强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后愈加需要获取海外殖民地。英、法两国列强侵略尤甚，凭恃武力强加奴役性条约于东南亚各国。英国专注于马来半岛、缅甸的侵略，1824年英国占领马六甲之后于“1826年英国殖民者把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三地合并为海峡殖民地，隶属于英属印度”<sup>[2]</sup>，1824年英国借口缅甸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为由发动第一次英缅战争，迫使缅甸签订不平等条约《杨达波条约》，其后为垄断缅甸对外贸易权，1852年借口缅甸“虐待英商”为由发动第二次英缅战争，将马来西亚、缅甸置于掌中。

法国专注于侵略中南半岛，于1862

年6月5日，法国迫使越南阮氏王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于1863年8月11日迫使柬埔寨王国签订《乌东条约》，又于1867年同暹罗签订《法暹条约》迫使暹罗承认柬埔寨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势力全面渗入印度支那。至19世纪中叶，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势力已进抵泰国边境，开始觊觎这片沃土。

泰国曼谷王朝在东南亚地区虽曾强盛一时，但作为农业国家全然无力抵挡英、法对东南亚的瓜分之势。1855年，英国派遣香港总督鲍林率领使团乘坐兵舰“拉特勒”号，不顾泰国反对，溯湄南河而上直抵曼谷，以强硬姿态要求通商谈判，敌我力量悬殊之下泰国被迫于同年4月18日签订了近代以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英暹条约》（又称《鲍林条约》），共十二款。按照该约：“对英国输入暹罗的商品和从暹罗输出到英国领土的商品征税，都不能超过市场价格的3%；允许对输入暹罗的鸦片免税”<sup>[3]</sup>。其后又于次年春签订补充特别协定，共十二条，“其中一条允许不列颠帝国的所有臣民可以畅行无阻地从欧洲和亚洲地区进入暹罗。”<sup>[4]</sup>可见，《英暹条约》及其补充协定使得泰国国门洞开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不甘人后，1856年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率兵舰抵达曼谷要求权益一体均沾，迫使泰国与美国签订同《英暹条约》类似的在美条约。

法国野心更大。1855年法国驻上海领事蒙蒂尼出使泰国，极力劝说拉玛四世国王取得法国外交支持制衡英国的计划，同年8月15日，法泰两国签订《法暹通商友好条约》攫取与英国同等权益，并获得了“允许法国臣民在暹罗王国各地自由地传播他们（天主教）的宗教”<sup>[5]</sup>特权。此

后，法国采取蚕食政策吞并泰国属国。

“1863年，法国在保护其属国越南‘历史权利’的幌子下，企图把柬埔寨东部兼并到越南，并宣布法国是柬埔寨的保护国”<sup>[6]</sup>。泰国在谈判中虽力陈柬埔寨是藩属国的历史事实，但最终屈服于兵威，于1867年7月19日签订《法暹条约》，正式承认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国地位，泰国与柬埔寨的宗藩关系自此作废。

可见，近代西方列强的纷至沓来致使泰国主权尽失，殖民主义者不断地对其政治和经济进行渗透，将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此以后，暹罗成为资本主义各国迅速发展的工业的市场之一”<sup>[7]</sup>。曼谷王朝软弱无力外国资本买办横行，泰国呈现出亡国先兆，面临步缅甸、柬埔寨等国后尘沦为殖民地的风险。

《暹罗史》曾言：“百年前东南亚一隅之地，独立邦国不下十二。而今硕果仅存者惟暹罗一国而已。姑无论适者生存论者立说之荒谬，然彼辈殆将承认暹人必具有其若干特殊之禀赋，是即所以使其得以维持如此独特之地位也。”<sup>[8]</sup>“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暹罗被迫同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时代，成了暹罗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暹罗封建社会发展的转折点。”<sup>[9]</sup>泰国面对英法夹击，唯有励精图治迅速实现自国的近代化改革，同时在外交上斡旋于世界各个强国之间，才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1851年曼谷王朝拉玛三世驾崩之后，拉玛三世的弟弟，蒙固亲王（King Mongkut）继承王位成为拉玛四世。“他是一个具有改革意识的佛教徒，以僧侣的身份度过了较早的成年时期”<sup>[10]</sup>拉玛四世出家期间通过和英、法传教士的沟通，接受了西式教育，习得英文及拉丁文，钻研

数学和理学。拉玛四世即位后面对危局，主张利用西方科学与技术推进泰国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为赢得改革的时间与空间，泰国选择采取平衡外交策略，利用英、法在东南亚殖民政策的矛盾，将自身定位为英、法势力的缓冲区，尝试以少部分代价获得国家独立。与此同时，积极在亚洲寻找共同抵御西方的盟友。

## 二、日本的“南进论”与近代泰日外交的展开（1887—1932）

众所周知，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基于“亚洲主义”概念出现了“亚洲同盟论”的外交理念。1880年旨在联合中、日、朝各国人士，挽救亚洲颓势的兴亚会成立，《兴亚会设立绪言》中写道：“窃惟方今亚细亚全州之大势，国不相依，人不相辅，委靡偷薄，苟且自安。当此之时，全州志士，孰不慨愤者哉。夫欧美诸州之能致隆盛者，皆由于彼此言语相通，情事谙练，故缓急可以互相维持也。呜呼，使我全州诸国若此，则振兴衰颓，而比隆欧美诸州，岂其难哉。”<sup>[11]</sup>认为在西方列强欺凌亚洲的大趋势下，日本独木难支。唯有与亚洲国家结盟支持其独立才能防止西方列强瓜分亚洲。泰国与日本在亚洲地区寻找盟友的需求两相契合迅速拉近了彼此关系。

1868年8月，拉玛四世不幸染上疟疾于次月驾崩，其子朱拉隆功继位。1873年朱拉隆功正式加冕为拉玛五世国王，立志“在暹罗推行以现行的欧洲观念为指导思想，促使暹罗实现近代化的全面改

革。”<sup>[12]</sup>1885年1月，具有留学欧洲和驻外使节经历的王族子弟和少壮贵族组成革新派势力主导政权，向朱拉隆功呈递《关于国家体制改革的王族及官僚建议书》，认为“泰国面临被英法分割殖民的危机，特别是法国侵略泰国尤甚，与其缔结的友好条约毫无裨益，为保持独立唯一方法在于统治形态的欧化”，“当今亚洲诸国中唯日本一国是进行欧化的国家，若主张与欧洲各国享有同等权力，唯有整备法律制度同欧洲各国及日本相同才能修改不平等条约”<sup>[13]</sup>有基于此，朱拉隆功决意开启对日亲善外交。

1887年，泰国外交部长泰瓦翁亲王出访英国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并在结束欧洲之行后访问日本。伊藤博文内阁借泰国亲王来访之机提出建交请求，“两国遂于1887年9月26日在东京共同签署《暹日修好通商条约宣言》”<sup>[14]</sup>正式树立了外交关系。

同时期，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基于亚洲主义的“南进论”风潮。其中菅沼贞风与稻垣满次郎的“南进论”最具代表性。1888年，日本经济史专家菅沼贞风创作《新日本的图南之梦》一书，开篇直言“日本当下之急务在于外交，外交之急务在于修改不平等条约，因此必须以小变大才能达到目的”<sup>[15]</sup>，“为不覆前车之辙应迅速组建出国劳务公司，不能错失进入印度尼西亚之机”<sup>[16]</sup>竭力鼓吹向东南亚移民，并认为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的国家，日本与暹罗并非是敌人应支助其富国强兵。1892年，东南亚专家稻垣满次郎撰写《东方策结论草案》一书主张“以台湾为根据地，若能置精锐军舰于太平洋中，则能掌握南北中国的大权、保持从香港经澳洲、巴拿马、尼加拉瓜、旧金

山、日本直达上海的太平洋航海权”<sup>[17]</sup>，“日本商业的对外政策应该是作为东洋乃至世界的贸易商”<sup>[18]</sup>，“取澳洲、美国、中国、印度之资源，经制造后贩卖给中国、朝鲜、西伯利亚、东南洋等各市场”。正是在鼓吹日本向东南亚进发拓展国力的“南进论”推动下，1891年8月，由稻垣满次郎出任干事长的“东邦学会”正式成立，致力于东亚及东南亚区域研究，并负责研究《日本暹罗修好通商条约》细则事宜。

1894年4月13日，日本派遣稻垣满次郎出使泰国，协商签订通商条约事宜。1897年，日本在曼谷建立外交领馆，任命稻垣满次郎为首任驻泰国公使。1898年2月25日两国正式缔结《日本暹罗修好通商条约》，据此条约：“两国互相在对方国派遣外交官，日本在泰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享有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待泰国法典编纂后改为两国对等享有领事裁判权”<sup>[19]</sup>。泰国之所以给予日本领事裁判权。一方面，基于亚洲主义联合抵御西方的战略。另一方面，源于平衡外交的考量。作为后进国的泰国在法律近代化方面较日本落后，泰国今后不仅要与特定国家签订条约，还要与其他国家广泛缔约。相较于英法的威逼，日本的价值远大于威胁，以给予其领事裁判权为条件，尽早与日本缔约有利于塑造亚洲国家合作先例，为今后的亚洲外交奠定基础。

《日本暹罗修好通商条约》缔结后，得到礼遇的日本全面扶持泰国推进近代化改革。法律领域，法学家政尾藤吉远赴泰国，组建法典起草委员会，帮助其编纂近代法典负责起草新刑法和民商法。农业领域，1902年日本指导泰国农业部设立养蚕司，派遣农学博士外山龟太郎担任技师

长、养蚕技师横田兵之助等人在曼谷等地设立养蚕实验所和养蚕学校。教育领域，“1904年派遣女子高等师范教授安井哲子，助手中岛富子、河野清子赴泰国帮助建立教育王室的皇后女子学校”<sup>[20]</sup>。宗教领域，日本鼓吹日泰两国在佛教信仰上的共同性，宣传“泛亚细亚”思想。正是在稻垣满次郎的积极活动下，“朱拉隆功雇用大量日本顾问，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权限，听从日本的意见推进改革”<sup>[21]</sup>日泰外交关系随着合作领域的拓宽日趋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在致力于近代化改革同时，面对英、法、德等西方列强咄咄逼人之势，殖民危机亦日益加深。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忍辱割让泰国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偏远属地和藩邦。至19世纪末，缅甸和马来半岛南部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越南、老挝、柬埔寨则成为法国殖民地。1887年，暹罗将其控制的老挝北部割让给法国，1893年割让老挝中部。1896年英法在伦敦签署《关于暹罗王国和其他事项的声明》，规定“湄南河盆地为英国和法国在中南半岛上的殖民统治的缓冲区”<sup>[22]</sup>。1904年割让老挝南部给法国。1907年，割让柬埔寨西部三个省给法国。至此，泰国丧失了对老挝和柬埔寨西部的控制。并在1909年将马来半岛四个邦割让给英国。

所幸的是，在泰国的平衡外交政策下“几个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谁也不愿意把暹罗让给对方，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使得暹罗能在形式上保持国家独立”<sup>[23]</sup>。反观日本，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跻身列强行列。怀有收复失地强烈诉求的泰国王室亲眼目睹了日本崛起的全过程，更加倾向于同日本发展更高层次的外交关系。

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立即参战。1917年，泰国以修改不平等条约条件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战后日本和泰国均成为战胜国，泰国在凡尔赛会议上实现了部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夙愿。日本则占据了德国在东南亚的利权。此后，日本财界开始认真地扩展在泰国的经济影响力。“把暹罗看作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影响的方便基地”<sup>[24]</sup>1920年拉玛六世正式出访日本，1924年3月，日泰两国修订《日暹修好通商航海条约》。1928年1月，日本与曼谷间的航班正式开通，同年12月，日暹协会成立，“其理事会中有14名日本商人和官吏参加。领导该协会各个分会的，都是暹罗和日本的亲王”<sup>[25]</sup>，“这个时期暹罗统治集团的政策方针的显著特点就是公开地渴望在政治上向日本靠拢”<sup>[26]</sup>。经济上，至20世纪30年代，东南亚不仅是日本的原材料来源地，也是工业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文化上，1926年日本在东京成立“暹罗协会”，由日本皇族秩父宫亲王任总裁，近卫文麿任会长的“暹罗协会”促进日泰两国各领域交流。日泰关系已经从单纯亚洲两国作为独立国之间的惺惺相惜发展为利益攸关的国家。

日泰外交关系的迅速发展打乱了法国企图蚕食泰国的计划，“暹罗政府的亲日方针，使法国外交当局陷入了困难的境地。因为法国耽心，一旦日本同暹罗结成同盟，法国就很难保持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地。法国外交当局考虑到这一情况，便对暹罗作出了某些让步，1925年夏天，暹罗同中南半岛解决了边界争议问题”。<sup>[27]</sup>可见，对泰国而言日本是其在东南亚制衡英法两国的重要外援。这也为1932年立宪革命后，銮披汶·颂堪军人政权全面加强与日本军事合作并最终发展为《日泰攻守

同》奠定基础。

### 三、泰国军人政权的“泛泰主义”与日泰军事同盟的形成（1932—1941）

曼谷王朝的“朱拉隆功改革”与平衡外交，虽然维持了泰国形式上的独立。但是未能根本上改变国力弱小的现实。一方面，泰国经济高度依赖外国资本。“1909年英国借给暹罗的战前最后一笔贷款是按年利4%计算，而1922年借给的二百万英镑的贷款则按年利7%计算利息，1924年借给的三百万英镑的贷款，年利是6%”<sup>[28]</sup>以至于暹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预算的八分之一的款项用于偿还外债。另一方面，暹罗工业化进程缓慢。“封建主的国家尽力支持土地贵族上层的代表人物，而对其他等级中任何人提出发展企业的建议，则竭力加以阻挠。外国垄断资本极力利用暹罗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系为自己谋利益。暹罗封建主同外国垄断资本之间在经济上建立了相互勾结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外国资本的竞争，国内的封建关系占统治地位和政权当局的恣意横行，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的发展”<sup>[29]</sup>。

曼谷王朝的君主专制体制弊病丛生，难以实现泰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海外贸易主要出口稻米、柚木、锡矿等原材料，无法摆脱产业的落后性，高度依附于世界市场。以至于1929年—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暹罗时，世界市场对于原材料与粮食出口需求的大幅缩减直接重创了泰国整个经济体系，生产萎靡国库日空。拉玛七世内外交困、无计可施，只好下令增加税收、削减开支、大量裁减公务员和陆军军

官，从而导致阶级矛盾和不同政治集团矛盾的尖锐化，最终导致1932年立宪革命的爆发。

1932年6月24日，比里·帕依荣领导的民党联合披耶帕凤、銮披汶·颂堪为首的陆军军官集团与銮信颂堪察为首的海军军官集团共谋发动政变，宣布成立革命政权要求国王接受立宪政体。6月27日，拉玛七世被迫签署并颁布《暹罗临时宪法》。这样，由泰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民党成为正式合法的政党组织，以此为基础致力于组建民主政府取代君主专制政府。10月，銮披汶·颂堪中校粉碎了保皇派的复辟活动与军事叛乱。日本作为第一个对立宪革命表示“同情”的国家，赢得了革命政权与泰国民众的对日好感。

1932年泰国立宪革命后不久，民党的政治主导权被拉玛七世及贵族势力窃取，拥立立宪政府首任总理由与皇室关系密切的保守派领袖披耶·玛奴巴功出任。披耶·玛奴巴功内阁采取反动政策来迎合旧势力背离了革命初衷。1933年6月19日銮披汶·颂堪中校等人再次发动政变。6月25日组成了披耶帕凤为总理的新的立宪政府，军官集团开始掌权。

泰国军人政权上台后，“不得不去面对和克服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和强国政治所带来的危险，再次接受维护暹罗不稳定独立地位的挑战”<sup>[30]</sup>。“现代军官集团是一个职业化的团体，现代军人也是职业化人员”，“职业内部的成员拥有一种有机体的共同意识，并且分享将自己作为一个群体同外行人相区分的自觉”<sup>[31]</sup>。在泰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泰国的军官集团具有高度的社会凝聚力，在推动和改变政治发展方面表现出举足轻重的作用。1934年9月，披耶帕凤内阁改组銮披汶·颂堪担任国防

部长，“公开宣称暹罗必须摆脱对英国的依赖，主张效法日、德法西斯国家的军人专政”<sup>[32]</sup>。

同时期，1929年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日美之间摩擦频生，协调外交的界限日益显露出来。日本面对可能失却利权的危局，代表国内强硬势力的陆军和海军表露出对华盛顿体制不满，挣脱欲望愈加强烈，主张改造国家打破现状的思潮在日本社会酝酿着极为凶险的冲动。1931年，日本陆军少壮派控制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直接斥逐武力将中国东北强行据为己有，随后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公然撕毁《九国公约》。

1932年9月，日本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的抗议，与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签订《日满议定书》，单方面承认伪满洲国。12月7日，国联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对于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对国际公义的破坏，各国深为担忧和愤慨。1933年2月24日，日内瓦召开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在国联44个成员国最后表决李顿调查团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投票中，42个成员国赞成，唯日本一国反对。泰国则保留态度投下唯一的弃权票。日本在径直走向国际孤立的道路上，泰国的中立行为博得了日本政府与国民的好感，视泰国为亚洲唯一的友好国家。

1934年，日本政府利用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2800周年由日本佛教青年协会主持“第二届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的契机，邀请泰方代表出席会议，从泰国军人政权中挑选10名身居要职具有前途的年轻官员访问日本，积极培植亲日势力。1936年3月，日泰两国签订《日暹新约》，按规定“允许日本人在暹罗长期居住，日本人在暹罗可进行宗教、教育和社会救济等活

动，并享有购置和租赁房屋、工厂、仓库和店铺及租用土地的特权”。<sup>[33]</sup>得益于日泰两国文化与外事交流活动的铺垫，日本也得到泰国军人政权的高度信任，“1935年泰国斥巨资向日本购买二十艘战舰扩编海军”<sup>[34]</sup>，军方强调只有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才能使泰国成功向前发展，主张与日本在装备采购、军官培训、军事训练各领域展开军事合作。日本军部也借此派遣军事顾问全面渗透到泰国各个军事部门，施加对泰国军队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向海外华人募集资金，组织抗日运动。在泰国的反日运动达到白热化。然而，披耶帕凤政权完全站在日本一侧，严格打击反日运动，不仅逮捕了5000名抗日华侨，并将其中的4000人驱逐出境。它还禁止传播了华侨煽动性的印刷品。1937年，泰国与日本在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最后议定书中承认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权益。这比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投弃权票的行为更进一步，泰国以更积极的方式表达了与日本合作的态度，标志着泰日外交蜜月期的深化。

1938年12月，銮披汶·颂堪亲自出任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政权的上台意味着少壮派军人正式取代元老派军人执政。

“在他的32名内阁成员中，参与发动1932年政变的领导成员占了30名，其中陆、海军军官又占了12名”<sup>[35]</sup>军官集团实现全面掌权。“他们都有在同一个军事学院学习的经历，被同样的课程所塑造，以及受到特别强调军人是国家保护人的公共价值核心的熏陶”<sup>[36]</sup>。

銮披汶·颂堪于1939年6月24日举行的立宪革命纪念日7周年庆典上进行了著名的“泛泰主义”演说，“今天我们所有行

业和职业都由外人把持，同胞屈服于外人膝下，我们不能让子孙后代依旧如此。纯正泰国血统的爱国者们应当一致对外。泰国人民的天性是不屈服于任何人”，“现在我们必须开始与外国人竞争。我们必须与他们斗争。”<sup>[37]</sup>采取民粹主义路线推行“泛泰主义”政策。所谓“泛泰主义是指“一种由法西斯思想家銮威集所倡导的积极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主张像日耳曼大民族主义一样，把泰国政治势力伸展到境外所有泰族人居住的地方去，并使泰族人加强团结起来。另一个意义是‘泰化’边境内的其他民族”<sup>[38]</sup>。

首先，颁布一系列名为“国民条例”的法令。通过法令确定国家的名称由“暹罗”改为“泰国”，确定国语“泰语”，民族为“泰族”。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宣传“大泰唯国主义”改造泰国社会。其次，有目的的打压华侨、华人实行排华政策。通过以“振兴国营企业”、“经济复兴之名”口号实行经济管制政策侵吞华侨、华人企业。再次，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通过《民校条例》强行关闭海外华人学校和强制推行泰语教育，促进海外华人的同化。“泛泰主义”民粹运动，客观上镇压了泰国的反日运动，但生活在泰国的日本人将其理解为亲日活动表示欢迎。

“从1938年起在泰国牢固地掌握了政权的大资产阶级中的执政阶层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开始站在公开的沙文主义立场上。泰国大资产阶级不仅竭力巩固自己国内的经济地位，而且还妄想占领邻邦法属中南半岛的领土，以便扩大自己的国家边界”<sup>[39]</sup>。受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层支持泰国銮披汶·颂堪军人政权为确保政权合法性与民族资本的扩张需要，刻意鼓吹“泛泰主义”政策。自身实力欠缺的銮披



汶·頌堪政权为有效践行“泛泰主义”，实行对内排华与对外反英、反法的民族主义扩张政策。尤其是提出“收复失地”的国家目标，以显示其政权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恰逢时宜地给予了泰国实现“收复失地”夙愿的可能。

1939年日本占领了中国海南岛，对英、法、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形成实质性威胁。同年9月，日本军队开始进入法属中南半岛的北部地区。“日本人进军东南亚强调了该地区民族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在宣扬的观点：亚洲人能够击败殖民国家和他们在东南亚的代表。”<sup>[40]</sup>1939年12月，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泰国立即宣布严格保持中立。在德国入侵的威胁下，法国政府为防止日本南下法属印度支那，维护其自身在东南亚的利益。提议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的泰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起初，泰国銮披汶·頌堪政权接受了这一建议。与此同时，泰国也向英国、日本发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

起初日本对缔约并不积极，但进入1940年代，纳粹德国横扫欧洲，使法国与荷兰等欧洲传统殖民强国臣服于其铁蹄之下，孤悬海外的英国也在纳粹的大规模空袭下蒙受重大损失。欧洲列强在亚洲殖民地的防卫力量空虚，被日本视为趁势夺取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大米、橡胶、锡、石油等丰富战略资源的天赐良机。1941年5月，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制定《对南方施策要纲》，要求日本进驻南洋。考虑到南进政策中泰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决意在英国之前抢先同泰国形成军事联盟。1940年6月12日，日泰签订《关于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和相互尊重领土的条约》<sup>[41]</sup>。

1940年6月22日，法国被德军的闪电

战击败被迫投降，成立德国控制的维希傀儡政权。

銮披汶·頌堪军人政权看到法国的衰弱，没有批准先前同意与法国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坐地加码要求恢复其在1887年、1893年、1904年和1907年割让的湄公河流域的“失地”，并于9月10日要求维希流亡政府归还其所有领土，以换取互不侵犯条约的批准。这一趁人之危的要求遭到了法国断然拒绝。泰国军队遂于11月底越过边境进入法属老挝，“收复失地”运动发展成了第二次法泰战争。“英、美、日帝国主义列强看到泰国同法国之间的冲突逐渐尖锐起来，都很高兴。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利用泰国的困难处境加强自己在泰国的势力”<sup>[43]</sup>日本计划利用泰国与法属中南半岛的边界冲突，拉泰国入伙加入轴心国阵营以便将来利用泰国的领土侵入英国殖民地。

1941年1月17日，泰军在暹罗湾附近大象岛海战中遭遇惨败，损失一艘最新的旗舰和两艘炮艇。銮披汶·頌堪对战况日趋胶着感到担忧，秘密请求日本居间调停。1月21日，日本施压法国维希政府。1月28日，法国在占据战场优势的情况下被迫停止军事行动。1月29日，法泰两国代表在日本海军停泊在西贡港的巡洋舰上举行停战谈判。“在日本的调停下，3月12日，法国以湄公河右岸流域作为非军事区的条件向泰国归还1904年和1907年割让的领土。”<sup>[44]</sup>作为成功调停法泰冲突，帮助泰国“收复失地”的报酬，1941年8月，日泰两国在东京签订了《关于安全和政治上互相谅解》议定书。该议定书实际上确定了泰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所建立的‘东南亚共荣圈’中的政治和经济作用”<sup>[45]</sup>。1941年8月，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和泰国三家主要

银行签订协定，规定：“泰国向日本提供1千万铢的贷款，以便日本利用贷款购买所需要的泰国商品”<sup>[46]</sup>。日本凭此能够购买泰国的全部橡胶、钨和25%左右的锡。泰国成为日本重要的战略物资供给地。

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与迅速的势力扩张最终迫使英、美、荷与日本的外交决裂。1941年7月26日，美国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产。8月1日，美国联合英国、荷兰加大对日制裁力度，事实上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全面禁运。英国同时宣布冻结日本在英资产，并废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和《日印通商条约》；荷属东印度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并废止当时仍有效的与日本的石油合同。日本资源短缺，石油80%以上依靠进口。美、英、荷等国所采取的石油禁运措施对日本是致命打击，迫使日本在停止战争与孤注一掷中做出选择。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上台。11月2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于12月初对英、美发动进攻。11月5日的日本御前会议最后审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如日美谈判至12月1日仍未获得成功则对英、美开战”。1941年12月1日，日本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对美、英发起进攻。12月2日，日本驻泰大使坪上贞二会见了奎披汶·颂堪总理要求与日本达成军事协议，允许日本军队“借道”和平地通过泰国领土。但遭到拒绝。3日，大使馆的军事官员田村宏少将会见奎披汶·颂堪，重申与日本达成军事协议的要求，披汶总理回答说，他将允许日本军队在泰国南部领土登陆，但由于一些部长的反对，他将要求暂时推迟日军进入泰国中部和东部领土。4日，田村浩少将带着这个答复去了第15军总部，建议在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将部队

和平地驻扎在泰国。5日，南方军总司令部讨论了日军的占领方法，重点是田村少将的意见。田村少将认为，应该在战争爆发后的48小时内，等待决定后，让日军在泰国境内驻扎，但最后决定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开始在南方驻扎，8日中午，在中东部驻扎。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大本营发出电报说：“我们将尽力以和平方式采取措施，如果有希望，我们可以稍微延长时间。”并指示继续与泰国谈判。

同一时期，日美双方虽持续进行外交磋商，但毫无进展。11月26日，美国最终向日本提出了空前强硬的《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全面从中国和中南半岛地区撤军，放弃独霸中国的企图、废弃三国同盟、否认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东条英机内阁鉴于石油储备将在第二年耗尽，油表已经成了战争倒计时的时钟，决意孤注一掷选择对美发动偷袭珍珠港的作战。

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运用“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翔鹤”、“瑞鹤”六艘航母搭载的414架舰载机穿云破雾，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重创其主力。自此拉开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开始时，日本军队的突击战略是同时攻击珍珠港和英属马来亚。然而，在最后一刻，海军放弃了夜袭珍珠港的想法，将时间改为凌晨3点30分（夏威夷时间上午7点30分），这意味着对英属马来亚的突然袭击将提前一个半小时进行。由于战略原因，在英属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作战必须与在泰国的辛戈拉登陆作战同时进行，为了成功实施突袭，日本人入侵了已经宣布中立的泰国。

日本时间12月8日凌晨2点，第25军

第18师（负责马来亚地区）在英属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掀起了对英美的战争。凌晨4点，第5师的先头部队在泰国南部的辛戈拉和巴塔尼登陆，与泰国军队交战，通过了与英属马来亚的边界，并向南朝新加坡进发。另一方面，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西贡的第15军判断，由于披汶总理的缺席，来自泰国的武装抵抗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在早上6点50分，它向在法属印度支那西部待命的近卫师团发出了进军的命令。上午9点，近卫师团陆续通过泰国中部的边境，向曼谷进发。同日，日本驻泰大使坪上贞二向泰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泰国给予日军“借道”通过的方便。“此时日本已强行把日军开进泰国境内，海军在泰南宋卡、北大年以及沿海一些港口登陆，陆军则越过印度支那向泰国中部推进”<sup>[47]</sup>。

泰国时间上午6点40分（日本时间上午8点40分），披汶总理终于回到了曼谷的总理官邸，并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日本人提出的“借道”建议。因此，决定只批准日本军队通过该领土，理由是泰国已宣布其严格的中立性，并应向列强表达其坚持这一国家政策的态度，以避免战争的蹂躏。披汶总理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待命的坪上大使，并在早上7点30分通过无线电广播向与日军交战的泰国军队下达了停火命令。上午11点30分，坪上大使和外交部长迪莱克签署了《日本和泰国关于日本军队通过泰国领土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泰国承诺“尊重泰国的独立、主权和荣誉”，条件是“允许日本军队通过泰国领土”并为此提供“所有必要的设施”。因此，虽然发生了一些局部冲突，但日军实现对泰国的和平占领。9日，第15军司令部抵达曼谷。披汶总理为了保持泰国

的中立地位，批准了日本军队的“借道通过”，但此后，他迅速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态度。9日，披汶总理会见了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并秘密承诺双方全面合作。

1941年12月10日，日本海军在马来海战中击沉了英国远东舰队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由此夺得制海、制空权，保障了海上输送任务的顺利完成。这令马来亚东海岸门户大开及容许日军继续进行登陆行动。在亲眼目睹了日本在马来战役中势如破竹的胜利后，泰国国内出现支持泰国与日本组成联合战线实现“收复失地”的舆论。鉴于1941年5月，法属中南半岛的“收复失地”已经通过日本的调解实现，但英属缅甸和马来亚的“收复失地”因为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而难以实现。因此泰国决议加入轴心国阵营，其目的是通过与日本的合作完成“收复失地”的夙愿。

1941年7月21日，“日本和泰国之间缔结《关于保证和政治谅解的议定书》。披汶总理告诉坪上大使，泰国已经下定决心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并同意与日本缔结攻守同盟条约”。<sup>[48]</sup>12月21日，銮披汶·颂堪与坪上贞二，代表两国政府最终签署《日泰攻守同盟条约》<sup>[49]</sup>。随着这一同盟条约的签署，泰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加入了日本阵营。1942年1月3日，日泰两国签署《日本和泰国联合行动协议》，决定日泰两国的军队将联合进行军事行动。为此，泰国承诺协助建造供日本军队使用的军事相关组织的设施，并提供军事物资、食品、劳动力和宿舍。1月25日，泰国终于向美英宣战。作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员，泰国决定通过增强国力，在日本庇护下来建立一个“泛泰国

国家圈”。

日本在珍珠港一役后暂时消除美国海军威胁、获得制海权的日本海军在与陆军配合下，借助泰国的支援自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的半年间相继占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战略要地，在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部肆意驰骋。泰国也成为东南亚地区的轴心国凭恃日本支持向“泛泰民族”地区扩张。

综上所述，在各国之间保持等距离的平衡外交政策是泰国外交一以贯之的理念。平衡外交政策使泰国在十九世纪末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厄运。泰国与日本作为整个亚洲地区硕果仅存的两个独立国家。基于寻找亚洲盟友的需求桴鼓相应彼此接近。自此，泰国视对日外交为对西方外交再平衡的筹码。日本也对泰国另有所图，

在与西方的博弈中从东南亚地区另辟蹊径缓解华盛顿体制下压迫日本战略危机。

1938年泰国军人政权上台后，泰国政治趋向保守，在“泛泰主义”政策，泛泰民族主义与日本侵略性民族主义相互契合利益一致。泰国为了摆脱英、法控制实现渴望已久的“收复失地”，最终将自己绑定在了日本的战车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泰攻守同盟条约》订立后泰国虽然表明放弃了平衡外交政策加入轴心国，但暗地里泰国统治层内部以比里·帕依荣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以协助同盟国展开“自由泰运动”的方式押注同盟国阵营。当日本败局已定后，1945年8月16日，泰国披汶政府宣布废除《日泰攻守同盟条约》，终止了该同盟，得益于“自由泰运动”的抗日功绩。二战后盟国由于各自利益最终谅解泰国的战争罪责。

#### 注释：

- [1] 邹春明、罗圣荣：《泰国经济社会地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第1页。
- [2] 余定邦编著：《东南亚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 [3]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近代史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216页。
- [4] 同注[3]第216页。
- [5] 同注[3]第222页。
- [6]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
- [7]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近代史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234页。
- [8] 吴迪著，陈礼颂译：《暹罗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页。
- [9] 同注[7]第234页。
- [10] 米尔顿·奥斯本：《东南亚简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8页。
- [11] 狭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 [12]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83页。
- [13] Krom Sinlapakōn. 1967. čham ů m Waiwōranat thun klao thawai khwam hen rūang čhat kan plianplaeng rabiap ratchakan Phaendin čho.sō.1247.pp.47-52.
- [1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3091099700 『修好通商に関する日本国シヤム国間の宣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15] 菅沼貞風：『新日本の凶南之夢』岩波文庫，1942年，第7頁。
- [16] 同注[15]第59頁。
- [17] 稲垣満次郎：『東方策結論艸案上』哲学書院，1892年，第95頁。
- [18] 同注[17]第61頁。
- [19]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2030055600、日本国暹羅国間友好通商航海条約ヲ公布ス(国立公文書館)」
- [20] 青山なを：『安井てつ伝』東京女子大学同窓会，1976年，第10頁。
- [21] 矢田長之助：「暹羅に関する恩出で」『暹羅協会々報』第9号，1937年，第77頁。
- [22]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4頁。
- [23] 同注[22]第5頁。
- [24] 同注[22]第20頁。
- [25] 同注[22]第21頁。
- [26] 同注[22]第20頁。
- [27] 同注[22]第21頁。
- [28] 詹姆斯・英格拉姆：《1850年以来泰国的经济变迁》1955年，第181頁。转引自：[苏]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6頁。
- [29]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3頁。
- [30] 戴维・K.怀亚特著，郭继光译：《泰国史》，中国出版集团，2009年，第237頁。
- [31] 塞缪尔・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頁、第9頁。
- [32]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224頁。
- [33] 同注[32]第224-225頁。
- [34] 吉川利治：「タイ国ピブーン政権と太平洋戦争」、『東南アジア研究』1982，19(4)，第366頁。
- [35]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229頁。
- [36] 戴维・K.怀亚特著，郭继光译：《泰国史》，中国出版集团，2009年，第235頁。
- [37] Phanit Ruamsin.1978. Nayobai kanphatthana setthakit samai ratthaban chōmphon pō.phibunsongkhram tangtae phō. Sō. 2481.th ũ ng phō.Sō.2487[Field Marshal P.Pibul-songgram's Poli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38to1944]. M.A.Thesis. Chula longkorn University.
- [38] 刘晚萍：泰族主义的认识，《民意》，1940年(126)，第11-12頁。
- [39]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23頁。
- [40] 米尔顿・奥斯本：《东南亚简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0頁。
- [41] 外務省：『明治百年史叢書：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東京：原書房，1969年，第432-433頁。
- [42]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2120202400、南方施策促進に関する件 連絡会議議事録 昭和16年6月25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43]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28页。
- [44] 林玉美：「アジア・太平洋戦争開戦に至る日タイ関係」『吉備国際大学社会福祉学部研究紀要』第13号，2008，第48頁。
- [45] 同注[44]第128页。
- [46] 《日本时报周刊》，1941年8月14日，第585页。
- [47]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234页。
- [48] 西野順次郎：『新版増補 日・タイ四百年史』東京：時事通信社，1984年，第110-111頁。
- [49] 外務省：『《明治百年史叢書》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東京：原書房，1969年，第575頁。

**参考文献：**

---

- (1) 稻垣満次郎：『東方策結論艸案上』哲学書院，1892年。
- (2) 菅沼貞風：『新日本の凶南之夢』岩波文庫，1942年。
- (3)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73年。
- (4) 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近代史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
- (5) 余定邦编著：《东南亚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 (6) 戴维·K.怀亚特著，郭继光译：《泰国史》，中国出版集团，2009年。
- (7)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 (8) 米尔顿·奥斯本：《东南亚简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